

# 《宋诗纪事》时政谣谚论略

方 燕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时政谣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形式,将公众的眼见心得发露于声,具有信息传递、褒贬美刺、舆论监督等重要功能。《宋诗纪事》所载宋代时政谣谚 56 首,就是反映宋代政治变迁、展现政治风貌的一道独特景观。

**关键词:**《宋诗纪事》;时政谣谚;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5-0075-09

清人厉鹗所撰《宋诗纪事》是一部宋代诗歌资料的汇集,其中卷 100 录有宋代谣谚杂语共 145 首,每首都附注来源出处,征引宋、元、明、清文献达 70 种之多<sup>①</sup>。这些谣谚杂语短者仅五六字,长则近 80 字,内容广泛,题材多样,涉及各地山川地理、奇风异俗、风物特产、气候特点、修身励志、卫生保健、街闻掌故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因所录内容或有传抄之误,故所引均核查原文,如“张公吃酒李公醉”本为唐代武则天朝谚<sup>②</sup>,将其视为宋代谣谚恐有归属失当之嫌。尽管如此,厉鹗广征博引,颇有眼光地对宋代谣谚进行搜集整理,展现了多元的社会舆论和丰富的社情民意,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而便利的资料来源,其意义、价值不容忽视。限于篇幅,本文拟就其中的 56 首时政谣谚进行探讨。

公众表达政治诉求、传递政治心声,统治者观访舆情、体察民意的重要信息渠道。《宋诗纪事》所录宋代时政谣谚议论朝政,臧否人物,预测国家命运和个人未来,揭示政治制度之特点,反映政治之变迁,从中可以折射世道人心,展现政治风貌。

## 1. 揭露统治腐败,抨击朝廷弊政

谣谚以尖锐的政治锋芒直击社会现实,正所谓“哀歌悲谣诽政讥世之为也”<sup>[1]卷34</sup>。真宗朝无名子嘲语“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反映宋初选官用人之滥。真宗时期仍然奉行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景德年间饱受战火摧残的河北一带士子颇受朝廷礼遇,凡举人都得以入仕为官,即或学业荒疏、没有真才实学的张存、任并之流也在被照顾之列。都下谚“宣医纳命,勅葬破家”,道出百官表面上沐浴皇恩,实则性命之忧、财产之险的无奈。皇帝宣太医诊视罹病的臣僚以示恩宠,太医用药急于收一时之效,结果适得其反,病者往往性命不保。内侍奉旨前往督办丧事,丧家又得看其眼色行事,任凭为所欲为,以致倾家荡产。神宗熙宁年间,汴渠谚“昔有磨磨浆水,今有碓捣冬凌”,指斥朝廷不顾百姓死活。旧制每年十月汴

时政谣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形式,历来是

收稿日期:2012-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研究”(批号:11XZS008)、四川师范大学重点项目“民间话语与宋代社会”(批号:08MSW02)。

作者简介:方燕(1969—),女,四川岳池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史、文化史及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渠关闭航运,王安石秉政,为迎接北使来贺,开通冬运,其时天寒地冻,令役夫挽舟,前设巨碓破冰导行,死者不在少数。新法苦民由此可见一斑。徽宗崇宁间谚“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钦宗靖康间语“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十不管谣“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山东,却管陈东。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皆讽刺大敌当前,朝廷施政不切时务,缓急失宜,措置失当。崇宁年间政府斥巨资兴建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sup>[2]卷178《食货志》</sup>,朝廷将其纳入州郡官吏考课的范围,稍有疏忽即获罪,而对储备军粮、赈恤贫穷一类的事务却不闻不问。钦宗靖康年间,金兵围攻东京汴梁,由于军民坚守,金人被迫暂时退兵,朝野上下主战与主和两派争论十分激烈,占上风的主和派置国家和个人安危于不顾(指岌岌可危的东京城以及使虏被拘未还的肃王赵枢),不想着整修武备,收复燕山,解山东、河北之急,却将精力放在处理诸如举人免解、改舒王王安石从祀、为开封尹聂山更名(因力主抗金,钦宗褒其有汉将周昌之节义,更名为聂昌)以及商讨前宰相蔡京的再贬、镇压反对妥协投降的太学生领袖陈东等问题上,“措置多不急之务”<sup>[3]卷37</sup>。在面临金人军事威胁、外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钦宗屡下求言诏令,表面上开通信息渠道,实则掩人耳目,故作姿态,战事趋缓,就不了了之。

宋代随着贫富分化和阶层流动的加剧,慕权位、重金钱之风盛行,南宋高宗建炎后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发酒醋”,即是对当时人以非常手段获官致富的辛辣嘲讽。宋时酒、醋本由官府督造、专营专卖,民间禁止私酿买卖,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犯禁者大有人在。而行在军中谣“张家寨里没来由,使它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讽刺高宗君臣苟且偷安,沉湎享乐,张家军统帅张俊治军严苛,以文身为记,防止士卒逃跑,役使军兵搬运花石,修建华宅美屋和名为太平楼的酒肆。

## 2. 聚焦封建官场,评议政治人物

在传统社会里,官员因其身份地位、社会角色的特殊历来为公众所瞩目,成为民间舆论关注的焦点。谣谚对各等官员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进行评价,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辨忠奸,别善恶,清浊自明。其中有对清官廉吏的推崇褒许,如深为朝廷所倚重的范仲淹、

寇准,有谣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范仲淹明肃通达,临事果决,锐意改革,兴利除弊,民间“有洛阳水月及范青天之谣”<sup>[4]补编卷5</sup>。“眼中丁”指权倾一时的奸臣丁谓,因其结党营私、劣迹昭彰,天下人无不切齿痛恨;“寇老”指当时被丁谓构陷罢免出朝的宰相寇准。此谣一语双关,蕴含深意。有以中正廉直立朝的包拯、韩左厢,京师语“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韩厢明,无白擎。韩厢死,白擎起”。包拯刚毅峭直,知开封府,不徇私情,执法公允,“包老之谣”<sup>[5]卷3</sup>赞其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韩左厢(左厢指临安府左厢官)为政严明,令行禁止,劫财者白擎子为之敛迹。还有以才华、政绩显名当世的胡伸、汪藻,太学中有“江左二宝,胡伸汪藻”之誉。至于那些造福地方、泽被乡里的官员也因深孚众望而赢得千古清名。如蓬州父老歌云:“使君来兮,父母鞠我。礼化行兮,民无寒饿。使君去兮,不可复留,人意怅怅兮,泪双堕。”襄阳人歌:“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镇江府民歌:“我漕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广东民歌:“石门之水清且清,晋吏一畝千古荣。争如李公投杯盟,江流汹涌杯停停。”这四首民歌是当地民众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和表达。蓬州知州吴几复发展生产,广施教化,离任时百姓苦苦挽留,含泪以别,将其比作养育子女的父母。叶康直知光化县,“凡政皆务以利民”<sup>[2]卷426《循吏列传》</sup>,如为平息火患,一改当地以竹为屋的传统生活习惯,教民用陶瓦盖屋,深受民众爱戴,将其与同样治绩斐然的谷城令丰稷相提并论,分别以“水”、“衡”称赞二人的廉直公允。蔡洸任镇江知府,当地久旱无雨,民众在漕水筑起一道土陂以蓄水溉田,如此一来虽暂时解决了灌溉问题,却使漕运受阻,漕司下令拆毁,蔡洸只得奉命行事,民众哭诉于前,护陂请命,此事因此作罢,也许是蔡知府“吾不忍获罪百姓”<sup>[2]卷390《蔡洸传》</sup>的心意感动上苍,不久天降甘露,漕运开通,岁亦丰稔。李纶提举广东常平,适逢其堂兄李维将赴任恩平,两人在石门江边饮酒饯别,李纶慷慨激昂,仰天而誓:“倘负军民,有如此水!”<sup>[6]卷96</sup>投入江中的酒杯竟然停住不下沉,观者无不惊叹,后来李纶兄弟在任上果真践行当初的誓言,以廉节奉公为人称道。

对于官员而言,谣谚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其官品人格的高尚与卑污,成为公众舆论评议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循吏清官具有忠正廉直、志节清白的个人品格,仁德爱民,推行善政,“民间实赖其利,至有形于

歌谣者”<sup>[7]卷18</sup>。而对于专权纳贿、结党营私的奸臣邪吏，“天下共知其恶，播于民谣”<sup>[8]卷180</sup>，使其显出本相，无处遁形。北宋奸臣主要集中出现于徽宗朝，民谣“大惇小惇，殃及子孙”是对把持朝政的宰相章惇与御史中丞安惇的咒骂，时有二蔡二惇之谣：“二蔡二惇，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sup>[9]</sup>大、小蔡指蔡京、蔡卞兄弟。二蔡二惇“表里相济”<sup>[8]卷180</sup>，朋比为奸。此谣咒骂四人作恶多端，必将贻害子孙，最终只落得抄家充军、不得为官的悲惨下场。而宣和年间的三首民谣“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抒发了民众对徽宗朝奸臣误国的愤懑和不满。权臣蔡京、王黼、高俅、朱勔、何执中，宦官童贯、杨戩、梁师成、李彦等沆瀣一气，把持朝政，搜刮民财，纵情享乐，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太学生陈东上书将蔡京、童贯、朱勔、李彦、王黼、梁师成称为“六贼”。其中，蔡京名列其首，他官至左丞相，崇政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拜太师鲁国公，先后任相十七年；童贯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执掌兵权二十年（此二人善于揣摩上意，反复无常）；王黼标价卖官，谋取私利，财富数以万计；朱勔弄权敛财，扩张势力，仅身着锦衣金带的家奴就达几十人。打筒（与“童”谐音）泼菜（与“蔡”谐音）正是民众敌对和仇恨童、蔡情绪的生动写照，“赵家世界朱家坏”、“便是人间好世界”等句更反映人们对时局的痛心和忧虑，对铲恶锄奸、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无限憧憬和向往。

后世论及南宋政治，总免不了将政治腐败与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奸臣专权联系在一起。南宋皇权式微原因较为复杂，但权奸祸国确为不容忽视之因，谣谚对此也多有反映。如都下谣：“释迦佛，中间坐。胡汉神，立两旁。文殊普贤自斗，象祖打杀师王。”以佛教人物位次、关系作比，反映宁宗朝天子拱手，韩侂胄、史弥远两大政治集团尔虞我诈、势成水火的政治状况。其中，“释迦佛”影指宋宁宗；分立两旁的“胡汉神”暗指韩、史；佛教四大菩萨中文殊、普贤以狮、象为坐骑，因韩侂胄以太师封平原郡王，谄媚者称其为“师王”，“师”、“狮”音谐，遂以“文殊”代指韩侂胄，而以“普贤”代指史弥远，以“象”指称参知政事钱象祖。钱为史弥远的死党亲信，因谏韩用兵与其相忤，两人合谋诛韩，向金请和。理宗当政时期大权旁落，前期史弥远专权，后期丁大全、贾似道用事，国事日衰。绍定中语“阴阳眠變理，天地醉经纶”，嘉熙间

时人为乔行简、史嵩之语“桥老无人度，松枝作栋梁”，淳祐中十七字谣“光祖为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这三首谣谚将讽刺矛头指向史弥远、史嵩之叔侄。史弥远依凭杨皇后，以宰相之制兼任枢密使，集政权、兵权于一身，操纵台谏，网罗党羽；而理宗饮酒纵乐，荒怠政事，听任史弥远专权擅政，称病不朝。“松枝”谐音“嵩之”，为双关语，奚落其庸碌无能，非国家栋梁之材。史嵩之在其父死后按照礼制本应尽节守孝，却效仿未终丧制就出任淮东总领、镇江守臣的马光祖、许堪，迫不及待地重执权柄，起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一时之间舆论大哗，十七字谣就是对史嵩之贪权固位的极大讽刺。宝祐年间，中书朝门语“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道出人们对时政的隐忧，“阎马”谐音“檐马”，意指悬挂屋檐下的铃铛，此处暗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当”谐音“丁东”，隐指丁大全和宦官董宋臣。理宗晚年阎妃专宠，侍御史丁大全、礼部侍郎马天骥巴结阎妃，丁升任签书枢密院事，马同签书枢密院事，宦官董宋臣权倾朝野，“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sup>[10]卷7</sup>。四人内外勾结，排挤宰相董槐，朝中人人自危。度宗咸淳民谣“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满头多带假，无处不琉璃”，“满头青，都是假。者回来，不作耍”三首，是对奸相贾似道乱政的贬斥。理宗死，度宗上台，贾似道因册立之功，专擅国政，比之韩、史有过之而无不及。度宗尊其为师臣而不称名，并特授平章军国重事，加号太师、魏国公，赐第宅于西湖葛岭，准其五日一朝。贾似道在葛岭建造高屋华室，美姬丽妾、奇珍异宝充于其间，终日游乐，不理政事，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代其处理朝中文书。宋人潘喆有《经贾秋壑故第》一诗：“相业如何不到头，诸公历历颂伊周。梦迷葛岭酣歌夜，鬼哭樊城血战秋。误国正须忧大厦，覆师宁忍驾孤舟。木棉庵里催归魄，谁掩湖山富贵羞。”<sup>[11]卷80</sup>权臣奸相误国，留下千古骂名，而士大夫中曲意逢迎之辈也招人唾弃。“由窠尚书，屈膝执政”，即映照出土大夫奴颜婢膝的丑态。由窠指从小门或边门入内，韩侂胄做寿，吏部尚书许及之来迟，差点被守门者拒之门外，只得择边门佝身而入。时隔两年，因官职未得升迁，又在韩面前涕泪交加，大表感恩戴德之意，竟至屈膝而跪。为求仕进而变节投身，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于此可见一斑。对于地方上强征暴敛、横行无忌的酷吏，谣谚则以暴虎、黑杀、毒虫之类作比，进行无情鞭挞。暴虎、毒虫言其伤人如虎，黑杀亦作“黑煞”，以凶星恶神喻其暴戾凶残，如秦人语“宁逢暴虎，不逢韩玉汝”，



“宁逢黑杀，莫逢稷察”。“稷察”指神宗时任陕西转运使的李稷和同样“以苛暴著称”<sup>[2]卷334《李稷传》</sup>的李察，“韩玉汝”指“酷暴少恩”<sup>[12]卷7</sup>的秦州知州韩缜。

谚语对政治人物的评价通常具有明确指向，大多属于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但也偶有褒贬参半者。如理宗端平间真德秀享有盛誉，名重一时，士民无不向往其风采，将之与元祐之际的名臣司马光并称，“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sup>[13]前集</sup> 权臣史弥远病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sup>[14]卷下</sup>。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奉召入朝，出任户部尚书。这位当初被视为能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却大谈心性之学，未发表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政见。士民失望之余，“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sup>[13]前集</sup>，讥其办事糊涂，徒有虚名。

### 3. 凸显官制特点，反映政治变迁

明人陆深认为，自宋以来，“官司各有俚语，以寓意评”<sup>[15]卷5</sup>。谚语以戏谑嘲弄的口吻从不同侧面揭示和反映了当时的制度性缺陷。

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建尚书省于外，设中书、门下省、枢密院、学士院于禁内。尚书省辖六部二十四司。其中，吏部下辖司封、司勋、考功，分管文官阶品、勋级、封命、考课；户部下辖度支、金部、仓部，分管天下户口土地、税赋徭役、国藏出纳、天下库储；礼部下辖祠部、主客、膳部，分管礼乐学校、祠祀天文、陵庙牲豆、诸蕃朝谨(以上三部属左司)；兵部下辖职方、驾部、库部，分管武官阶品、地图城隍、舆辇廐牧、兵器卤簿；刑部下辖都官、比部、司门，分管律法案件、俘虏审理、经费器械、门禁关卡；工部下辖屯田、虞部、水部，分管城池工役、天下屯田、苑囿山泽、河流沟洫(以上三部属右司)。由于官、职分离，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任命正式官员，但若非皇帝特命，并不管本部职事，且各司职分轻重，劳逸不均。故当时有谣称：“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泼袴。刑都北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吏部大权在握，掌管文官的升迁黜陟；户部事务繁琐，疲于应付；礼部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兵部入不敷出，捞不到实际好处；刑部冤案迭出，错案频发；工部清闲冷落，徒有虚名。宋室南渡，情形为之大变，“吏勋封考，三婆二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齏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北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身饿鬼”。

宋代枢密与中书并称两府，享受与宰相相同的禄赐礼遇，唯趋内朝、侍宴、赐衣等事皆援引唐制。“大宴，枢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赐食，与阁门、引进、四方馆使列坐庑下，亲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赐衣门谢，则与内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书则别班谢于门上。故朝中为之语曰：‘厨中赐食，阶下谢衣。’”<sup>[16]卷2</sup> 唐时枢密使以内臣充任，“故常与内诸使副为伍”<sup>[16]卷下</sup>。而宋代沿袭旧制，枢密使位尊权重，却“杂用内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轻重失序，盖沿革异时，因循不能厘正也”<sup>[16]卷2</sup>。宋时三班院掌铨衡内廷供奉及殿直官之责，所属官员每年乾元节都要凑份子布施饭食僧人，并一起进香为皇上祝寿，称为“香钱”，余钱常被主事官挪作餐费。群牧司判官统领宫内外作坊的事宜，其俸禄的优厚非别司官员可比，每年仅卖马粪钱一项收入就十分可观，以充公用。因此，京城人取笑道：“三班吃香，群牧吃粪。”

### 4. 预测国家命运，昭示个人结局

讖谣是以神秘语言的形式预测未来，指导行事，具有主观性和隐晦性，其中不少讖谣关乎国家盛衰兴亡。如北宋初年流传的“寒在五更头”之讖。据说出自著名隐士陈抟之口，预示大宋王朝享国之长短，“称第五庚申后又十五年而祚移”<sup>[17]卷10</sup>。“宋以庚申起运”<sup>[17]卷10</sup>，太祖即位于周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庚申，针对此说力图进行禳救，“命宫中转六更”<sup>[18]卷21</sup>，即令宫中更夫每到四更末就直接转打六更。待大宋亡国，人们方才参解其意：“更者，庚也”，“五更”即“五庚”，“理宗景定元年，历五庚申，越七十年而宋亡”<sup>[18]卷21</sup>。似乎王朝气数早有前定，尽人事也只能听天意。北宋灭亡之前，上天同样屡有示警，亡国之兆数现于当时。如宣和初年，宋军收复燕山，内徙京师的金民中传唱这样一首童谣：“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蓬蓬为一种状如球形、“风起则转”<sup>[6]卷236</sup>的植物。臻蓬蓬歌演绎方式别具一格，歌者以鞭击鼓，且歌且舞，看似漫不经心的挥洒，实则蕴涵深意，宋王朝表面的繁华掩不住已被掏空的内里。“满城不见主人翁”隐指“徽宗南幸”、“二圣北狩”<sup>[19]卷47下</sup>，统治者行将走上穷途末路。宣和末年，宝篆宫瑶仙殿左门上惊现“家中木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巨木又摧倾”几行大字，当时不明其意。靖康之难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家中木”合起来即为“宋”，“南方火”则代表以火运主国的大宋王朝的“德运”。《册府元龟》卷一云：“皇朝以炎灵受命，赤精应讖，乘火德而王，混一区夏，宅土中而临万

国,得天统之正序矣。”<sup>[20]卷1</sup>至于“吉人”、“巨木”分别为徽宗赵佶、钦宗赵桓的拆分之字。宋室南渡,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服妖”之说甚嚣尘上<sup>③</sup>,各种奇异装束亦被视为不祥之兆。如度宗咸淳五年,“贾似道以太傅平章军国重事,禁天下妇人不得以珠翠为饰”<sup>[21]卷19</sup>。当时京城妇女皆佩戴碾玉,宫中簪琉璃花,里巷妇女竞相仿效,蔚成一时之风气,“妇人行步皆琅然有声”<sup>[21]卷19</sup>,故有“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之谣。“琉璃”为离乱之象。《佩韦斋集》卷19云:“琉璃谓流离也。西域传罽宾国有琥珀流离,则琉璃字本流离也。”<sup>[21]</sup>《宋史》卷65亦云:“《唐志》琉璃钗钏有流离之兆,亦服妖也。后连年有流徙之厄。”南宋末年,临安有谣“江南若破,白雁来过”,当时不明所以,宋亡后才知“白雁”为奉元世祖之命一举收复江南,掳掠少帝、谢太后北上的中书右丞相巴延(亦称伯颜)。

讖谣中还有部分是对个人荣辱祸福、命运结局的交代。如北宋哲宗元符末年,都城童谣“家中两个葡萄精,撞着潭州海藏神”,隐诮不可一世的权臣以悲剧收场。“两个葡萄精”指蔡京、蔡卞;“撞着潭州海藏神”指蔡京失势,于钦宗靖康元年(1126)被贬岭南,“道中市食饮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驱逐之”<sup>[22]卷8</sup>,最终在病饿交加中死于潭州。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安徽舒州爆发汪格领导的矿工起义,淮西歌“秀才姓汪,骑驴渡江。过江不得,做尽趋跄”,即预示起义失败、汪格被诛,“州兵入其家,缚之。其子拒杀,聚恶少数千为乱,声言渡江。事平,格亦伏诛”<sup>[2]卷66《五行志》</sup>。淳熙十四年,临安城中流传“汝亦不来我家,我亦不来汝家”之谣,当时不明究竟,后来方知“为绍熙二三年两宫隔绝之兆”<sup>[23]卷23</sup>。“两宫隔绝”指光宗在皇后李氏的挑唆下,置父子亲情于不顾,拒绝探视生命垂危的孝宗,甚至不愿为其主丧。宁宗嘉定三年(1210),京师街巷传唱一首奇怪的歌谣,末句都是“东君去后花无主”。“东君”含义主要有三。一为传说中的日神,朱熹《楚辞集注》云“此日神也。《礼》曰:‘天子朝日于东门之外’”<sup>[24]卷2</sup>,由“日”进而喻指皇帝。二为东方司春之神句芒,王闳运《楚辞释》云:“东君,句芒之神。”<sup>[25]</sup>三为东宫太子。当时皇嗣为朝廷敏感问题,宁宗的八个儿子中有七子未及成年就先后夭折,仅存新立储君赵询,此谣虽表意模糊,但无论是针对皇帝还是储君都被视为大忌,因此很快遭到禁止,但没过几年,太子暴亡,时人将之视为不吉之兆。

上述讖言包含某些真实的信息因素,但总的来说

颇多“附会牵合”<sup>[26]卷159</sup>之处,因其兆于前,验于后,将征兆附会人事,“以势推事”<sup>[27]前言</sup>,解释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偏狭性,不可避免地涂上人为润饰的痕迹,并掺杂有妄自猜度的成分,有的讖言甚至不能排除为事后虚构杜撰的可能。

## 一

陈寅恪说:“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sup>[28]162</sup>自宋立国,“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sup>[29]卷25</sup>,统治者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重视文治教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sup>[30]</sup>。这就为时人的思想和言行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谈谐戏谑、议论朝政等皆为常事,公众言论相对自由。美国政治传播学家丹·尼谋认为,政治就是谈论,不论在朝在野,谈论是政治活动的重要一环<sup>[31]5</sup>。阿尔蒙德将公民谈论政治视为“政治参与的一种主动形式”<sup>[32]141</sup>,认为个人对政治现象的态度可区分为认知的、感情的和评价的三个部分,并以此作为评价公民政治倾向的标准。古代社会政治体制不完善,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公众对政治的态度、倾向和评价难以通过体制性渠道表达出来,民间舆论遂成为有力补充,谣谚即是下情上达的一种信息沟通渠道。“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sup>[33]卷124</sup>,以获得最新的民意动向,故采风制度在历史上相沿成习。有宋一代商品经济发达,市民文化繁荣,为谣谚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民族矛盾的尖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政治腐败现象的潜滋暗长,也成为时政谣谚产生和传播的推力。

《宋诗纪事》所载时政谣谚通常是以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人事任用、社会不良风气等为主题,反映和评价宋代各种复杂的政治现象。这些谣谚兼采南北东西,覆盖地域广,如淮南谚、淮西歌、都城谣、春陵语、平江讖等。有的说明大致时间,有的标明具体年号,大多集中在北宋徽宗朝以及南宋宁宗、理宗、度宗朝。所谓“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sup>[34]卷37</sup>,王朝政治腐败、弊窦丛生之时恰是谣谚纷起之际。谣谚雅俗兼有,有的清丽雅致,别具一格。如前引蓬州父老歌。又如镇江府民歌:“我漭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有的浅显易懂,琅琅上口。如都人谚“陈三更,董半

夜”,反映士大夫中享乐之风、奔竞之风的盛行;“三班吃香,群牧吃粪”,讽刺官员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黄河灾,天水来”,表明人心思宋,渴望收复故土。谣谚大量地运用谐音、双关、拆分、隐喻、夸张、排比、拟人、借代、选择等表现手法。如仁宗朝语“草头木脚陷人倒”,用拆字法讽刺“同在两禁,人以为险波”<sup>[2]卷294《苏绅传》</sup>的梁适、苏绅,隐语其姓,卓木脚为梁字,草头为苏字;十不管谣使用排比句;“宁逢暴虎,不逢韩玉汝”,“宁逢黑杀,莫逢稷察”使用选择句;臻蓬蓬歌采用比兴手法;“桥老无人度,松枝作栋梁”,“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等句,运用谐音双关;“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等句,则以事物、人物设喻,其中“阎罗”之比尤为生动传神。“阎罗”为佛教地狱之神,其含义有二:一是“特喻其刚严,即史云咸称神明之义”<sup>[35]卷17</sup>,如民间相传寇准死后作阎罗王,统辖幽冥世界;二是“以喻嬖倖”<sup>[35]卷17</sup>,如理宗宝祐年间,宦官董宋臣欺上罔下,专横跋扈,人称“董阎罗”。“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取前义,将包拯比作阎罗,以褒其“忠烈贯天地而不朽”<sup>[35]卷17</sup>。谣谚的创编没有固定的章法规制,形式多样,反而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加之内容的灵活性而流传十分广泛。

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信息传播的5W模式,将信息交流分为五个环节: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sup>[36]16</sup>。就宋代时政谣谚而言,大多来路不明,“不知谁所造”<sup>[37]卷23</sup>,其始作俑者往往潜踪屏迹,难以查实。史籍所载谣谚创制者如“有人”、“无名子”、“市井小人”、“卖浆者”、“邑人子”<sup>[2]卷347《孙贻传》</sup>之类无不具有匿名性、隐蔽性。宁宗开禧年间,市语“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冷底吃一盞,冷底吃一盞”,取其谐音同义,“潮”与“朝”、“盞”与“斩”同音,“冷”与“寒(韩)”同义,天下指韩侂胄为国贼。《四朝闻见录》云:“韩用事岁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类,天下大计,不复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且诵言云:‘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京尹廉而杖之。又有卖浆者,敲其盞以唤人曰:‘冷底吃一盞,冷底吃一盞。’”<sup>[38]戊集</sup>表面上看起来属于小商小贩推销商品的行话,实则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市井小夫兴谣言而讥訕”<sup>[39]卷2</sup>,抑或是有人精心谋划创编,借儿童和穿行于街巷通衢的商贩之口表达对当时朝政的强烈不满。有的谣谚虽明确交待出于太学生

或优伶之口,但同样姓名难寻,踪迹难考,如太学生语“不救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sup>[40]卷中</sup>,与社会上流传的十不管谣如出一辙,亦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宋时太学生被誉为“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意思是太学生虽然生活清苦,如同佛寺里带发修行的僧人,但志行高尚、心系家国、关心时政,“国有大事,谏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能攻,公是公非,伟节相望”<sup>[23]卷22</sup>。理宗统治前期,丁大全擅权,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指陈其恶,人称“六君子”,后被开除学籍,流放边州。淳祐四年(1245),临安三学(指太学、宗学、武学)学生及京学生等近四百人集体抗议丞相史嵩之妄图起复,酿成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波。而优伶出入各种欢宴喜庆的场所,以专门的表演技艺谋生,特殊的职业特点使其获取信息较为方便,信息来源渠道广泛,无论宫闱秘事还是民间传闻、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消息多有所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见解看法可以通过所装扮的舞台人物以假隐真、曲折隐晦地表达出来,也可以在插科打诨之间大胆地直抒胸臆。《清异录》卷下云:“天下多口不饶人,薄德无顾藉,措大打头,优伶次之。”<sup>[41]</sup>优伶的嬉笑怒骂,敢于发人之所未发,即或宠妃权臣也成为其揶揄嘲讽的对象。蔡卞就因不光彩的“裙带官”而受到优伶的耻笑,他娶王安石小女为七夫人,对其言听计从,“每有国事,先谋之床第,然后宣于庙堂”<sup>[42]卷3</sup>,后凭借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得以官拜右相,蔡家设宴张乐以庆,“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此言出人意料,颇堪玩味。宋代权相当政,往往控制言路作为政治运作的手段,本为“耳目之官”<sup>[2]卷12《仁宗本纪》</sup>的台谏,遂沦为个人争权逐利的工具。而优词乐语讥陈时病,寓理于谐,比之言官谏净毫不逊色,故时有“台官不如伶官”<sup>[43]卷4</sup>之说。一般来说,对于优伶的诨话戏语,听者不以为怪,或在特定的场合、氛围下不便发作,如此优伶能够幸免于难,但也有因此获罪者。《西湖游览志余》卷五载:“士流无耻者多以钻刺进秩。官宴时有伶人执拳石以大钻,钻之久而不入,叹曰:‘钻之弥坚。’一伶遽扑其首,曰:‘汝不去钻弥远,却来钻弥坚,可知道钻不入也。’举座弃栗,翌日,弥远杖伶人而出之境。”

时政谣谚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强烈的爱憎情绪,具有信息传递、褒贬美刺、舆论监督等重要功能。所谓民谣,按照《诗演义》解释:“盖小民群聚,为鄙俗之歌而不成文理者,乃其常态,是之谓民谣者也。”<sup>[44]卷10</sup>看似鄙俗而不成文理的谣谚实际上“皆人



心一事感触之声也”<sup>[45]卷9</sup>，能比较真实自然、客观集中地反映社会现实，故为政者大多将其作为衡量世情民心的主要依据和观察政治得失的重要途径，“圣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听用者莫如民，是故观天意于灾祥，察民情于谣俗。因灾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谣俗以知政之善否”<sup>[8]卷300</sup>；“凡吏治之能否，士风之美恶，民生之休戚，皆惟观采风谣”<sup>[46]卷7</sup>。谣谚是公众政治智慧的结晶，针砭时弊，褒清抑浊，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喻的特点，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谣谚作为公众舆论评议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统治者无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如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动用国库为阎妃修建功德院“显庆寺”，其精巧富丽的程度远胜于毗邻的大宋祖宗功德寺—灵隐寺和净慈寺（又名上、中、下三天竺寺），人称“赛灵隐寺”。于是，有人乘人不备，题字于法堂新陈列的大鼓之上：“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两片皮”，以示嘲讽。理宗大怒，“行下天府缉捕，岁余，终不得其人”<sup>[13]别集卷下</sup>。有的谣谚还直接影响了官员的人事任用。如仁宗嘉祐年间，京师谚“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即是为时任三司使的包拯和益州太守宋祁代言，希望能够对两人委以重任，第二年朝廷果然顺从人望，“包亦为枢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学士承旨”<sup>[47]卷11</sup>。时政谣谚将公众的政治诉求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信息扩散速度快，影响面广，充分发挥了社会舆论的正面导向功能，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带有主观性、随意性，尤其是有的歌谣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兴造谤讟，百般中伤”<sup>[48]卷31</sup>，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如理宗嘉定年间，身为左丞相兼枢密使的吴潜即“遭谣诼之诬”<sup>[49]续集卷39</sup>，含冤离世。当时吴潜与其兄吴渊同朝为官，吴渊为政严苛，遭人嫉恨，吴潜为人刚正，敢于犯言直谏，与理宗及右相贾似道渐生嫌隙。贾为排除异己，扫清权路，于是摇唇鼓舌，妄起风谣：“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足，若使飞天能食龙。”“蜈蚣”与“吴公”谐音，“大蜈蚣”指吴潜，“小蜈蚣”指吴渊，一说指吴潜一党，“飞天食龙”暗指吴潜有图谋不轨之心。此谣很快从社会上流传至宫中，理宗惊闻其详，“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坚”<sup>[50]卷3</sup>，后将吴潜罢相，贬至潮州，又再贬于循州。这种歌谣可以说是具有明显政治动机、精通诡诈之术的人所放出的试探性气球，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产物，相当于“伪谣”<sup>[51]卷173</sup>，实际上是一种处心积虑、刻意散播的谣言，目的在于煽惑视听，打击政敌。

“社会舆论是在一定社会群体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对社会现象所发生的倾向较为一致的意见”<sup>[52]350</sup>。时政谣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舆论形式，将公众的眼见心得发露于声，直白而不隐讳，灵活而不板滞，议论时事，讽喻政治，宣泄情感，传递心声，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张邦炜老师赐教，提出十分宝贵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 注释：

- ①如正史 2 种（《宋史》、《宋季三朝政要》），笔记小说 45 种，杂史 6 种，诗文 12 种，方志 5 种，除明人杨慎的《古今风谣》、凌迪知的《万姓统谱》、清人沈钦韩的《范石湖诗集注》外，其余所引均为宋元典籍。
- ②唐人张鷟《朝野僉载》（中华书局 1997 年版）卷一云：“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宋人程大昌《演繁露续集》（中华书局 1991 年版）卷二亦云：“则天时讖谣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另，本文凡未注明史料出处的引文，均出自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 ③参见刘复生《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 参考文献：

- [1]蔡襄. 端明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90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元)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石茂良. 避戎夜话[G]//说郭:宛委山堂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4]范仲淹. 范文正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89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5]林駟.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42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6](明)彭大翼. 山堂肆考[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75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7]朱熹.晦庵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8](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9]宣和遗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1](清)厉鹗.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2]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3]周密.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4]张端义.贵耳集[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5](明)陆深.俨山外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6]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7]罗璧.识遗[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8](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9]宣政杂录[G]//说郛:涵芬楼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0]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1]俞德邻.佩韦斋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2]王明清.挥麈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3](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4]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5](清)王闿运.楚辞释[M].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 [2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7]谢贵安.从谣言到预言:流传千年的中国谶谣文化[M].台北:未来书城,2003.
- [28]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9](清)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 [30]刘浦江.祖宗之法:再论宋太祖誓约及誓碑[J].文史,2010,(3).
- [31]周鸿铎.政治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 [3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马殿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33]欧阳修.文忠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34]礼记正义[G].郑玄注.孔颖达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0.
- [35]爱日斋丛钞[G]//说郛:涵芬楼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36](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37](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38]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9]王迈.臞轩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40]庄绰.鸡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1]陶穀.清异录[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42]周輝.清波杂志[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43]蔡條.铁围山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4](明)梁寅.诗演义[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45](明)章潢.图书编[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46]徐元杰.楛莛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47]魏泰.东轩笔录[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48]刘敞.公是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49]翰苑新书[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50]宋季三朝政要[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2]陈新汉.社会评价论导论——认识论的一个新领域[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 Discussion of Folk Songs and Proverbs On Current Affairs Recorded in *Songshijishi*

FANG Ya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Folk songs and proverbs on current affairs, as a special social linguistic form, show what people see or feel by voice, with significant functions of delivering information, appraising praise and satire, and public supervision. This thesis is to discuss the folk songs and proverbs on current affairs of Song Dynasty recorded in the *Songshijishi*, which reflect changes in politics and presenting political style and features.

**Key words:** *Songshijishi*; folk songs and proverbs on current affair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

### ● 书 讯

## 唐代兴教授新著《灾疫伦理学: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一书出版

我校文学院唐代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灾疫伦理学: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已由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正式出版,总字数44.3万字,定价60元。该论著开辟了灾疫伦理学新领域,并从理论、方法、实践三个维度入手初步构建起灾疫伦理学的学科体系。

该论著由导论和本论两部分构成。导论共三章,是全书的主旨,整体探讨灾疫伦理学学科蓝图,为本论探讨提供宏观视域、认知引导、价值导向、方法规范。首先,定位了灾疫伦理学学科性质和实际社会功能;然后,探讨其学科对象、目标、视域和研究方法;最后,整体勾勒灾疫伦理学学科蓝图:一是围绕灾疫人为论、人与环境的亲缘性存在、生态逻辑法则、限度生存四个方面来构建灾疫伦理学的认知基石,二是通过对其学科范畴、核心概念、基本概念的探讨,初步建立起灾疫伦理学学科概念系统,三是围绕当代灾疫境遇而设计灾疫防治实践的社会伦理方案蓝图及评价其实践的指标体系。

本论共17章,分五篇,主要围绕“灾疫防治”而构建由认知到行动的当代灾疫防治的社会伦理方案和实施方法体系。

第一篇“灾疫防治的生存反思与伦理检讨”,为当代灾疫防治提供一个反思性的历史视野和伦理检讨的现实出发点。第二篇“灾疫防治的目标、公理、原则”,首先整体勾勒“预防治理为本、救助治理为辅”的灾疫国策和“治理为本,防范为辅”的预防战略,探索构建“在全新制度框架下重建生境→在国际平台上构建生态家园→在全球视域中创建生态文明”之三级目标体系;然后分别探讨构建能够指导当代灾疫防治实践的伦理公理和以“利益补偿”为核心的权利原则体系。第三篇“灾疫防治的根本内容与核心问题”,构建当代灾疫防治的认知体系和制度平台。第四篇“灾疫防治的历时性探讨”,围绕灾疫预防伦理实践、灾疫预警伦理实践、灾疫后重建伦理实践三个环节进行系统探讨,初步构建起当代灾疫防治实践行动的纵向社会伦理方案及实施操作方法。第五篇“灾疫防治的空间性探讨”,围绕灾疫生境重建伦理实践、灾疫治理伦理实践、灾疫生命伦理实践、灾疫康复伦理实践和灾疫教育伦理实践等领域,展开共时性探讨,初步构建起当代灾疫防治实践行动的横向伦理方案及实施操作方法。(钮鹏松)